



北京文学
创作丛书

BEIJING
WENXUE
CHUANGZUO
CONGSHU

王蒙小说报告文学选

北京出版社

毛 岳

小说报告文学选

北京出版社

封面设计：任建辉

·北京文学创作丛书·
王蒙小说报告文学选

出版：北京出版社
(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

发行：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北京印刷二厂

737×1092毫米 32开本
12,875印张 244,000字
1981年1月第1版
1981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38,000
书 号： 10071·311

定 价： 0.98元

王蒙

王蒙，一九三四年生于北京。一九五三年开始写作长篇小说《青春万岁》。一九五五年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第一个短篇小说《小豆儿》。一九五六年参加第一次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后，写了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这篇小说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受到了一些人的激烈抨击，并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关心和保护。

一九五七年后，除六二年曾发表过两个短篇小说外，二十多年不能写作。粉碎“四人帮”后，发表了许多短篇小说、评论、散文、杂文、报告文学等。其中《最宝贵的》与《悠悠寸草心》分别被评选为一九七八年和一九七九年度优秀短篇小说。

一九七八年，《青春万岁》方得正式出版。



你老豆腐。”您骗我。”“是您的。”“您说您没有工作。”“是的，我三个月以前才从北大荒‘退役’回来的。但是，下月一早我就要上班了。”“在哪个科研机关？”“不，街道办事处。修理雨伞。”“您回想起什么了。”“万能山。”“优先进修和优先学习。”“共商时间学。”“因优进修修理雨伞吧？还是用恐龙的骨骼做一柄伞？”“您听我说，要不，您真以为我老豆腐，也是精英，错……职业是第一的手段，^{是进步的}是某个时期的社会主义。
人应该比职业强，人应该是世界的主人。^{所以}
人应该有知识。做一个懂得恐龙的修伞者，^比
做一个不懂恐龙的修伞者更伟大也更幸福。^{也是职业的主人。}
“我不懂。”“不，您懂。再见。”“明天见。”
“明天”两个字便像毒药的险发芽。然而明天他
没有来。明天的明天他也没有来。毒害老豆腐
妈妈。
“是你，你这几日没来。”“我被封死了。”“那
……“我们也都快死的。所以时间最宝贵。
“我的宝贵的时间是用来搞妻子。”“搞妻子也很
好。搞妻子以外你还有好多时间。”“我无所事事。”

6×6=36

XINJIANG DUNHUAN TUAN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五团

1988年5月15日

作者手迹

自序

一九五三年深秋的一个晚上，在离北新桥不远的一幢新建的二层小楼里，当时担任共青团的干部的十九岁的我，怀着一种隐秘的激情，关好那间办公室兼宿舍的终年不见太阳的小屋的门，在灯下，在一叠无格的白片艳纸上，开始写下了一行又一行字。旁边，摆着各种工作卷宗、没有写完的汇报、总结，如果有人敲门，我准备随手把一份汇报草稿压在白片艳纸上，作出一副正在连夜写工作材料的样子。在写作生涯刚刚开始的时候，我考虑的是失败和嘲笑，我感到的是力不从心的痛苦。

即使这样，当我坐在桌前，拿起笔来的时候，我意识到这是发生了一件影响我的一生命运的事情。我觉得神圣，觉得庄严，深知自己是在努力把美好的、却也是稍纵即逝的生活记录下来，是在给热烈的、难以把握的激情赋以固定的形式。我真诚地认为，写在纸上的东西，也许其丰富多采不及活生生的生活的千百分之一，然而它是热情的结晶，是生活的光泽，是青春的印迹，它比生活事件本

身更永久，比生活事件本身更能为千万人所了解。它是心灵的历久不变的、行远不衰的唯一的信息。

于是我认为作家是世上最幸福的人，他能够了解别人也被别人所了解，他能够同时与一千个，一万个，十万个朋友谈心，他永远也不会孤独，他永远和千百万人民在一起，去建立全新的、最美好、最公正也最富裕的生活。

在我当时所工作的共青团区委会的院落外面，是一个新华书店门市部，我常常到那里去吸吮油墨的香味。我徘徊徜徉于书林，流连忘返。我希望有一天我的书——我的心，也能坦露在这里。

这是我写《青春万岁》时候的情形。后来，它终于出版了，不是在当时，而是在我的孩子的年龄已经超过了我当时的年龄的时候。它从写作到出版用了二十六年的时间，比四分之一个世纪还要长。一九七九年，它出版的时候我已经不那么激动了，我已经知道了写作需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和风险，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心血、眼泪、青春，有时候还包括鲜血和生命。

因为文学追求光明，向往真理，渴望发展和进步，因为文学是人学，它以人为中心，它要求人成为真正的人，它要求人和人的关系成为真正的人的关系——共产主义的关系，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关系。所以它要与一切剥削制度作战，要与黑暗、与愚昧、与一切反动和保守的势力和思想、与一切虚伪和谎言作战。这样，一切黑暗和反动势力不能不把文学视作眼中钉。在我

上中学的时候，我已经知道了被枪杀的柔石、殷夫、胡也频……的名字。在十年浩劫期间，我每每惊异于江青一提起作家就有那么强烈的、本能的、应该说是兽性的恐惧和仇恨。

我的第一个文学教师是我的姨母。一九六七年她来到新疆伊犁我当时的家，几天之后因为脑溢血发作而长眠在那里。我至今记得她如何为小学二年级的七岁的我的第一篇作文添加了一个警语式的结尾，那好象是一篇描写春风的“文章”，姨母“代”我在结尾处写道：“风啊，把这大地上的黑暗吹散吧！”老师没有怀疑这句话是否可能出自一个孩子之口，她兴奋地、密密麻麻地为之加上了红圈。

是的，文学应该成为驱散黑暗的一股清风，成为催醒百花，唤来燕子和百灵的一股春风。正是为了驱散黑暗，我从少年时代便参加了当时还处于地下状态的党组织所领导的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人民革命斗争。我从少年时代便成为这个党的一名战士。在学生运动当中，文学是革命的号角。不但有鲁迅、巴金、丁玲的作品，而且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有《铁流》和《土敏土》，有《李有才板话》《白毛女》《吕梁英雄传》《洋铁桶的故事》和《我的两家房东》在蒋管区的青年学生中间流传。我始终认为，象《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样的书，培养了苏联的、中国的、世界的一代或者几代革命者。

我始终认为，文学与革命天生地是一致的和不可分的。它们有着共同的目标——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鲜红

的太阳照遍全球。文学是革命的脉搏，革命的讯号，革命的良心；而革命是文学的主导，文学的灵魂，文学的源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所以能培养不止一代革命者，首先是因为革命的烈火，革命的理想与实践培育了奥斯特洛夫斯基和他的书。

所以，当人们用革命的名义、用辉煌的、一时难以辨认的革命的言辞向文学大张挞伐的时候，最后甚至用这种名义来强奸文学、消灭文学的时候，我感到撕裂心肝，撕裂身体和灵魂的痛苦。我的人格似乎真地分裂了：要忠于革命，必须背叛文学，而爱文学搞文学，竟意味着会变成革命阵营的可耻的叛徒。

解放后的每次政治运动几乎都是以文学开刀，终于，开刀轮到自己头上了。

于是，我“自觉地”，努力去否定文学，抛弃文学，首先是否定自己。“你和你的作品是多么渺小，多么卑鄙！”我力图去相信批判会上的这种声音，因为它不但宏亮震耳，而且义正辞严。我确实发现了文学的渺小——它连一个大嗓门的批判的气势都没有，我还希望能发现文学的卑鄙，发现以后我会心安理得地躺到人们为我指出的下榻处所——历史的垃圾堆里去。如果消灭了我所热爱过的文学以后果然产生了新兴的、“新纪元”的、可以用尽一切革命词藻来形容的文学的话，如果我在进入垃圾堆以后中国果然变得更纯洁、更美好、更幸福的话，我何乐而不乖乖地躺在那里？

于是我由衷地欢呼“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我认真地努力去领会“冲霄汉”“冲云天”“能胜天”之类的样板壮语。不怕人笑话也不怕人抓辫子，我其实觉悟得很晚，更谈不上有什么抵制，我甚至曾经努力去领会“三突出”“高大完美”，尽管在我的潜意识里对这些货色充满了厌恶，尽管我常常在睡梦中哭湿了枕头。

在这一段时期，对于我来说，神圣的、永恒的、郑重和伟大的文学变成了渺小的、软弱的、可怜的、任人宰割、任人驱使的文学了。它不过是舞文弄墨的雕虫小技！它不过是自欺欺人的信口开河！它不过是权力的奴婢，它不过是附在大人物的皮上的一撮毛！呜呼，文学！别了，文学！

文学果然也成了卑鄙的了，它满纸谎言，它欺骗和麻醉人民，它变成了黑店人肉包子里的蒙汗药，变成了刽子手杀人时的遮羞布，变成了造谣和诽谤，变成了阴谋整人的小花招……

不仅是文学，生活里有多少咋咋唬唬，其实是渺小而又卑鄙的人和事。面对这些，我一筹莫展，我既缺乏认识，更缺乏力量，也缺乏勇气，我在苟活，我在坐待。我在一九五七年被指责为渺小和卑鄙以后，二十年后，当真感到自己是渺小和卑鄙的了！

然而与此同时，我认识了真正的伟大与崇高。在生活的最底层，在最边远的地方，与人民同甘苦，共呼吸，站在人民的立场看那些年的戏法魔术、风云变幻、翻手云雨，孰是孰非，孰胜孰败，洞若观火！

挫折和失败锻炼了、丰富了我们。于是乎，迎来了 一九七六年的十月，中国终于发生了注定要发生的、人民期待已久的事情。历史是最无情的，历史也是最多情的。我们获得了第二次解放，因为历史的规律是人民一定要自己解放自己，一次不行就再来一次。

拨乱反正就是起死回生。党重新把笔交给了我，我重新被确认为光荣的、责任沉重的共产党人。革命和文学复归于统一，我的灵魂和人格复归于统一，这叫作复活于文坛。复活了的我面临着一个艰巨的任务：寻找我自己。在茫茫的生活海洋，时间与空间的海洋，文学与艺术的海洋之中，寻找我的位置、我的支持点、我的主题、我的题材、我的形式和风格。

因为，不论我怎样欢呼这二度的青春，怎样愿意一切重新从二十三岁开始，愿意去寻觅二十四岁以前的脚印，然而我的起点毕竟已经不是二十几岁而是四十几岁了。尽管回忆童年是一件美好的、撩人心绪的事情，然而人们无法重新作儿童。尽管回头看《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以及散文《新年》使我伤感、使我含泪微笑、使我壮心不已，然而，同时也有一种麻木的隔世之感。

二十岁的时候，生活和文学对于我象是天真烂漫、美好纯洁的少女，我的作品可说是献给这个少女的初恋的情诗。初恋的情诗可能是动人的，然而它毕竟是太不够，太不够了啊！而现在，生活和文学对于我来说，已经是一个庄严、干练而又慈祥的母亲。她额头的皱纹，述说着她怎样在风暴

中挺立，在烈火中再生，也述说着她曾经怎样遭受娼妓和巫婆的欺凌；她的宽广而又温暖的胸膛，却仍然是那样圣洁、温柔，充溢着生命的乳汁，充溢着博大而又深远的爱。

不论有多少好心的读者希望我保持“组织部”的“年轻人”的风格，然而，这是不可能也不必要的。二十年来，我当然早就被迫离开了“组织部”，也再不是“年轻人”。然而，我得到的仍然超过于我所失去的，我得到的是大有作为的广阔的天地，得到的是经风雨、见世面，得到的是二十年的生聚和教训。故国八千里^①，风云三十年，我如今的起点在这里。不论《布礼》还是《蝴蝶》，不论《夜的眼》还是《春之声》……都有远远大于相应的篇幅的时间和空间的跨度，原因也在这里。研究“小说做法”的人也许会摇头，然而，我无时不在想着、忆着、哭着、笑着这八千里和三十年，我的小说的支点正是在这里。

对于青春，对于爱情，对于生活的信念，革命的原则与理想，我仍然忠贞不渝，一往情深。说我的风格与以前判若两人了，恐怕不符合事实。然而，我现实得多了，我看到了生活的艰难，看到了一切美好的东西还需要成熟，需要成长，需要锻炼和完善自身，需要通过一个又一个的考验。于是，即使浪漫和透明如《风筝飘带》，我的情歌里仍然有一种清醒和冷峻的调子。我的歌不再是少年的小夜曲，为了赞美我的伟大的，历尽沧桑仍然充满了活力的大海一样的母亲，我需要的是运用一切配器和声的交响曲。

① 八千里：指北京到新疆的距离。

是的，四十六岁的作者已经比二十一岁的作者复杂多了。虽然对于那些消极的东西我也表现了尖酸刻薄，冷嘲热讽，然而，我已经懂得了“凡存在的都是合理的”的道理。懂得了讲“费厄泼赖”，讲恕道，讲宽容和耐心，讲安定团结。尖酸刻薄后面我有温情，冷嘲热讽后面我有谅解，痛心疾首后面我仍然满怀热忱地期待着。我还懂得了人不能没有理想，但理想毕竟不可能一下子变成现实，懂得了用小说干预生活毕竟比脚踏实地地去改变生活容易。所以，我写小说的时候，比起来用小说揭露矛盾、推动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我更着眼于给读者以启迪、鼓舞和安慰。所以，在《布礼》和《蝴蝶》里，我虽然写了一些悲剧性的事情，却不想、也几乎没有谴责什么人。《说客盈门》虽然写得刻薄，但我对“说客”们并无苛责，丑陋的小萧和曾经美貌的女演员都不是什么反面人物。我对他们仍然充满情谊。

有一个不辞万里，远道而来看我的青年读者问我：“经过了几十年，你自己就没有刘世吾的东西了吗？”我不好回答。赵慧文曾经责备刘世吾“什么都知道，什么都见过……于是他不再操心，不再爱也不再恨。”我几十年来总算也见过、知道了一些事情，我力求看问题、写小说更全面、更实际、更深沉一些，然而，我仍然在操心，仍然在爱，仍然敢于面对任何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

至于恨，我的恨是有限的。不滥用恨，我认为这是保持和发展安定团结的一个精神条件。但是我也并非麻木不仁，并非明哲保身，我找到的一个武器是讽刺与幽默。在

《买买提处长轶事》的前言里，我把幽默视作维持生存的因素。但是那位处长的“幽默”里却带有痛苦的、值得同情的阿Q主义。荒诞的笑正是对荒诞的生活的一种抗议。

有一位友人表示不喜欢我的笑，认为我是用一笑了之来掩盖矛盾和磨光自己。是耶？非耶？读者自明。但我真诚地觉得我们哭得太多了，我们有笑的需要和笑的权利。我甚至认为，笑可能是比哭更高级也更复杂的感情表示。动物里有会哭的（例如屠刀前的羔羊），而只有人会笑。因此，即使在我写得最规矩、最正经、最抒情的作品里，仍然不乏笑料。同样，我也追求漫画式的、闹剧式的笔法中的严肃的东西。

复杂化了的经历、思想、感情和生活需要复杂化了的形式。我尝试着在作品中运用复线条、甚至是放射线的结构，而不拘泥于一条“主线”。我试图用突破时空限制的心理描写，来充分展示前面说过的“八千里”和“三十年”，展示这八千里和三十年中的不同的事物之间的联系和对比。我上下古今中外以求索，求索的目标仍然是创作中的“我自己”。我不否认我有所借鉴，不仅对外国文学有所借鉴，而且还对李商隐和李贺的诗，对侯宝林和马季的相声有所借鉴。但是，我的试作的形式仍然来自我脚下的土壤，我们自己的生活。首先是我们的生活复杂化了，节奏加快了，而后我的小说才变得多线条和快节奏了的。我找到了吗？我成功了吗？也许，我还是在摸索、在试验罢了。也许我真正要写的东西还在后面。也许我永远也找不到了？

不要再多说了吧。“当局者迷”，请读者千万不要过分相信作者自己的解说。同样，我们也不必拘泥于既定的文学模式。有作品在，解释权，解剖权属于读者，相信读者会做出自己的结论。

今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了我一九五五年——一九七九年的中、短篇小说集《冬雨》。为了避免重复，本集对于一九八〇年以前的小说尽量少选，另外，本集在体裁上采取综合的办法，除评论外，收集了小说、散文、报告文学，还有一篇译作，可以在以小说新作为主的前提下包罗“万”(?)象，更全面地反映我的文学劳作。如果再加上《冬雨》和北京出版社出版的我的评论集《当你拿起笔》，大概就可以为热情的读者、严明的批评家提供相当的解剖依据了。

亲爱的读者、批评家和同行们！请把你们的解剖结论和医疗建议告诉我！请你们帮助我！前面已经说过，我正在追寻，我希望我不要成为生活和文学这严峻而又慈祥的母亲的不肖子。五十年代的小小试笔，不过是序幕罢了，近三年，确切地说，只不过两年，我的文学创作活动，才刚刚开始，刚刚起步呢！

• 北京文学创作丛书 •

为了进一步繁荣文学创作，促进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本社从一九八〇年起编辑出版《北京文学创作丛书》。

《北京文学创作丛书》将陆续收辑首都专业和业余作家的个人选集；以新作和建国以来的代表作为主。同时，也注意收辑全国各地作家反映北京生活的作品选集。

《北京文学创作丛书》坚决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倡题材、风格、表现手法的多样化。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剧本、散文、诗歌等作品均拟入选。

目 录

自 序 (1)

散 文

新 年 (1)
祭长者——邵荃麟同志 (5)
国庆的礼花 (10)
激动与沉思 (13)

报告文学

火之歌 (19)

短篇小说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 (35)
最宝贵的 (81)
歌 神 (88)
表 姐 (115)
夜的眼 (129)
说客盈门 (141)